

## 在地知識與全球理論的勾連關係： 「家」的基進化可能

趙彥寧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21世紀的家：台灣的家何去何從？》(以下簡稱《家》)一書由黃應貴主編，集結九篇論文，作者群包括兩位社工學者(王增勇、黃嫺齡)、一位精神分析學家(彭仁郁)、一位社會學者(潘恩伶)、以及五位人類學研究者(林文玲、林瑋嬪、王梅霞、陳文德、鄭瑋寧)，係為「新世紀的社會與文化」預定發表的十本系列叢書之首作。儘管作者群的专业訓練背景不盡相同，研究方法皆為深度訪談與民族誌研究法。除了王增勇、彭仁郁、與林文玲三文，具有特定文化傳承模式的族群(外省二代、桃園八德的南部漢人移民、太魯閣族、泰雅部落、卑南族、魯凱族)顯然是主要的研究對象，這個特點可能也在反應主編於〈導論〉所稱的原初問題意識：

「現代核心家庭」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產物，而不是普遍存在的真理。因此，有關家的爭辯與討論，都必須放回其歷史條件及其社會文化脈絡中，才可能給予家的型態及性質妥當的位置，從而得以有效面對未來發展上的可能性。(黃應貴主編 2014:2)

〈導論〉開宗明義指出，2013年十月「社團法人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簡稱「伴侶盟」)提至立法院討論的「多元成家」方案所引發的市民社會和學界激烈爭辯，是該書問題意識的擬定社會脈絡，而由各篇作者的研究發現，主編導出以下結論：

由前述，我們已知在新自由主義的條件下，個體與自我得以發揮到極致，只得個體的存在先於家庭的存在，更使家的構成不再依據血緣、姻緣而來的親屬原則或人際間的權利義務關係，成員的情感更具有決定性。事實上，家的想像及成員間在日常生活是否建構出共同的生活節奏與互動上的心理慣性，不僅決定家能否維持，更決定了家的性質與意義。(黃應貴主編 2014:24)

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界跨領域的研究合作成果，該書前引宗旨已顯示，這是一項試圖結合與反省當代社會學界 Anthony Giddens (1992) 揭櫫的現代社會親密關係建構模式、以及傳統人類學界「親屬研究」(kinship studies) 的對話性 (dialogic) 嘗試。故而，物質條件的全球結構（在此稱為「新自由主義」）與在地社會的互相創構關係，親密關係的諸種面相（倫理的、情感的、想像的、實作的），以及連結過去、此刻、與未來的時空軸線，應為該書切入研究的關鍵。這個宏觀的研究企圖，因此具有以下重要貢獻：首先，可藉由在地多元社會／族群的民族誌研究成果，以豐富化正統社會學界多遵循西方社會歷史進程而歸因的現代化人類經驗；此外，古典人類學界有關親屬的研究，多執著此類親密關係人士的分類、稱謂、與互動儀式，該書多位作者則著重分析日常生活實作、想像藍圖、以及倫理與情感的雙元互動形式，以重新審視「家」與「親密關係」的多元意義。本文將逐項回應上述企圖，並提出幾點反思和批評。

## 多元照顧乃是家庭／親屬關係的核心實作

如前所述，親密關係之所以可以連結，日常生活的共同實作至關重要。此類實作形式固然多種，綜觀該書多篇論文，則可知「照顧與被照顧」(caring and being cared for) 應屬關鍵。而透過此類既是慣時性的 (sequential)、也可能是隨機突發性的 (contingent)，往往默會知情的 (tacit)、但也常是單方向的、或甚且具有衝突性的照顧關係，個人與親密他者的互動倫理準則得以被揣摩、確立、或挑戰，並引發歡愉、幸福、困惑、焦慮、痛苦等諸種情感並存的主體性 (subjectivity)。故而，我們可以發現該書彰顯的多元家庭形貌，在相當程度上與 Faubion and Hamilton (2007: 535) 所試圖闡釋的親屬特質一致：亦即，家庭乃一種難以被取代之特定人群主體化的組織 (a distinctive system of subjectivation) 與同樣特殊的倫理範疇 (ethical domain)。

不少篇論文彰顯該項事實，唯個人因於研究對象社群的語言慣習，故而使用稍微有異的關鍵詞，然其差異，也彰顯了各類家庭成員的連結性質 (connectedness)、情感表述、對自我與親密他者的情感認同和倫理期待不盡相同，彼此的差異也凸顯了家庭這個主體化的關鍵機制的多元性。在林瑋嬪的研究中，「家人」不僅包括不見得具有原生親屬關係的移民，更必須包括原鄉的神明，而二者關係的實體化變動過程，取決於神明對於從事建築工地高度危險性之勞動的「看顧」(黃應貴主編 2014: 220)，意涵居高臨下無所不知地時時主動警醒世間家族成員的照顧與保護作為；而在另一方面，

當環繞著敬神活動而激發彼此互相照顧的倫理實作，逐漸為搏利性質的賭博所取代時，多元家庭的親密關係也就快速瓦解。「愛憐」則是王梅霞一文的關鍵詞，同時包含「愛」、「同情」、「憐憫」的情感活動，且多激發於個人身心有礙的情境，並得以同時連結人神、尊卑親屬、夫妻、與朋友之間的多重親密關係（黃應貴主編 2014：279）。鄭瑋寧則使用「關照」一詞，以強調照顧與自由之間取得平衡之精巧實踐的複雜技藝（黃應貴主編 2014：437），且該類技藝顯然必須鑲嵌在當代魯凱人的物質條件、以依法行政系統為代言人的國家權力施為、多重家人（包括寵物狗）的關係理解等等參照系統（referential systems）中，方得以實作（或難以實作）。

## 超越他我互動連結的想像能力，是多元照顧的基礎

具有創發效應的照顧，絕非機械式的體力或情緒勞務，若不具有想像他者苦難與需求的能力和動機，積極與基進照顧勢必困難實踐，而多元家庭也就無法成形；同時，個人最感親近的家庭組合，也往往是創構上述創發性想像能力的關鍵場址。共同的感知實作，對於該想像能力的創構實屬必要，其引發的力道，且可聯繫過去、此刻、與未來的關連形式。比如，黃嫵齡的研究固然詳盡描述了精神障礙第二代外省榮眷如何為配偶或子女拒斥，但也藉由某報導人收藏夾娃娃機等玩偶的實作，以建構其「夢幻家園」並撫慰親密關係的創傷（黃應貴主編 2014：92）。鄭瑋寧則以建蓋新家屋的實例，指出「家人對不同世代成員生活安排的想像以及家人情感的重要性，甚至家屋的意義，如何發揮作用各有想像」，且這些想像皆以照顧關鍵親密他者之未來福祉為導向（黃應貴主編 2014：435）。

然而，可以推知，源自極度限制性想像能力的照顧實作，恐怕也會造成負面的情感、自我認同、與社會關係的負面效應；換句話說，照顧也可能產生暴力性的後果。彭仁郁一文或許最明確地彰顯了上述事實：亂倫受害者的長年創傷，並非源自性行為本身，而是在幼小時期，彷彿無自我意志地順服父親性慾所需、並且萬事親為地照顧對方日常生活的親密關係藍圖已被建立，以致於成長後極難發展其他情慾與家庭關係的想像能力，故而在親密關係與社會生活裡屢遭挫折。王增勇的研究也指出，居家服務的社工員「很清楚地站在一個『監察員』的角色上，預設案主都是想要欺騙社工員的潛在福利詐欺者」（黃應貴主編 2014：50），故而研發不少揭發詐欺作為的技術，而這些技術的設計出發點，莫不為其想像的三代同堂和樂家庭，故而無視物質條件等等社

會結構不義所加諸當事者的作用。

《家》一書固然相當詳盡地分析了多元家庭的實作、情感、與連結實作，但我以為，該書或許也有若干可供主編與作者群們反思的問題。以下逐項說明我的論點。

## 結構功能論的陰影？酷兒們（queers）在哪裡？

多元成家立法方案，以及因此可獲民法確認與保障之收養、財產繼承等等公民權益，是該書〈導論〉起始處所稱引發此跨學科研究的原初問題意識。然而綜觀全書，除了林文玲一文專論跨性別者成家、以及鄭瑋寧一文裡以四頁描述的報導人 Yuri（黃應貴主編 2014：448-453），再無非異性戀者的研究案例。但即使是林文與鄭文，也少談性（sex）、性／別（sexuality）與性別（gender）之間的互相創構性關係；而固然黃嫺齡與鄭瑋寧二文（尤其是黃嫺齡）述及浪漫愛的期盼、實作與阻礙，全書幾乎未談情感、性慾與性愛之間如何互構的議題（除了彭仁郁分析之「毒性家庭」裡所成就的高度傷害性父系單邊亂倫情慾）。偏重情感而忽略性慾和性的主軸，不僅如 Gayle Rubin（1984）所警醒地過度潔淨化了親密關係的屬性，也可能在無意之間再生產了當代酷兒學者致力批駁的異性戀正規性（heteronormativity）機制（參見 Warner 1991），而對於親密關係的某種整合人群與彌合衝突的期待，也使得全書似乎籠罩在某種結構功能論的陰影之下。該書各章民族誌研究發現豐碩，作者群若可重新耙梳研究資料，並借此重新檢驗性、情慾、親密關係建構模式與倫理關係、以及異性戀常態性的霸權性質，我以為更可以全面且本質性地描模當代台灣社會變遷的樣貌與文化機制。

## 何謂新自由主義？其社會作用又係為何？

繼「全球化」（globalization）之後，「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恐怕是晚近國際學界最常統稱此刻社會問題與其特性的籠統名詞（umbrella term）了。在人類學界，誠如 Cultural Anthropology 兩位主編 Anne Allison 與 Charles Piot（2014: 3）所述，如同「現代性」（modernity）、「資本主義」（capitalism）、「發展」（development）和「種族」（race）等關鍵詞，「新自由主義」之意似乎不理自明。這個問題似乎也出現在《家》一書。如前所述，「新自由主義」是開宗明義表述之造就晚近台灣各種多元家庭形貌的關鍵「條件」；然而，該書以為與定義的「新自由主義」究係為何、何以這是理解各篇

研究論文的必要全球化政經結構因素、以及該主義又以什麼樣的方式與台灣整體以及各個在地文化社群產生哪種形式的關聯？我以為上述圖像並不十分清楚。某些作者完全不提新自由主義（比如，王增勇、黃媛齡、彭仁郁、林文玲、陳文德），其他作者則以略微帶過的篇幅予以表述，且多僅陳述彈性工時這個面相（比如，鄭瑋寧）。Allison 與 Piot 統合歷來人類學者對於新自由主義的理解，可知這個當代人類社會的「常態性狀況」具有以下特質：國家退出社會場域（或市民社會）、市場化益趨普遍、逐步高昇的不平等社會資源分配與再分配、將前述問題訴諸個人的責能。《家》一書多篇論文作者，尤以王增勇、林瑋嬪、鄭瑋寧為然，實已彰顯了上述特質；故而，若全書可以提出對該現象的統合性概念化論述，我以為應可以對全球性理論的在地化這個知識工程，提出更尖端的貢獻。而若輕忽這個知識生產的可能性，我也擔心某些社會結構不平等的問題，也會為「新自由主義」這個傘式術語（umbrella term）所隱形，其中我以為最明顯的，便是原／漢種族主義化的底層遷移勞動議題、以及原民與東南亞移工貌似共同佔據 4D（dirty, dangerous, deskilled, demeaning）彈性勞動場址的事實。

## 引用書目

黃應貴主編

2014 《21世紀的家：臺灣的家何去何從？》。台北：群學。

Allison, Ann, and Charles Piot

2014 Editor's Note on "Neoliberal Futures." *Cultural Anthropology* 29(1): 3-7.

Faubion, James D., and Jennifer A. Hamilton

2007 Sumptuary Kinship.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80(2): 533-559.

Giddens, Anthony

1992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Redwood Cit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ubin, Gayle

1984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Pleasure and Danger*. Carole Vance, ed. Pp. 267-319.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Warner, Michael

1991 Introduction: Fear for a Queer Planet. *Social Text* 29: 3-17.